“九一八”事变前我在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

赵 唯 刚

1925年,我中学毕业后,通过同学父亲的关系,得到东北军总参议兼兵工厂督办杨宇霆的支持，由东北兵工厂垫支学费留学日本(毕业后回到该厂工作偿还)。就这样,我和同班毕业的四名同学一起前往日本千叶县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在日本学习期间，我结识了李人一（李国琛，中共地下党员）。他是我思想进步的启蒙老师。在他的启发诱导下,我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释》、《列宁主义十二讲》和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书籍。他还带我参加一些会议,听进步演讲,如反对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等。我的觉悟逐渐提高，逐渐地懂得了旧社会里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的关系、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区别，还有为什么要国共合作、什么叫治外法权,以及关税自主等问题和概念。那时,日本翻译苏联新书速度很快，一本书不用一个月就能翻译过来。不过，关键、重要之处,往往用点点点代替,一般人看不明白,所以我往往和李人一两人一起学习，他能帮助我理解。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大浪淘沙,泥沙俱下,各种思想观点都有,同学间时常争论不休。十月革命后,苏联于1924年宣布取消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这对中国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震动很大。1925年,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对旧军阀张作霖。这一切，使我认识到绝不能再走旧军阀的道路了。1925年12月,我写了一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通过我同学父亲的关系,登在奉天《国民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报》上。这是我下决心走革命道路的誓言。

1927 年 6 月(或 7 月)10 日,我在日本由李人一和老王(名字不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大阪支部领导下工作。

1927 年 9 月，我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随即和原来同去的四名同学回沈阳到东北兵工厂报到，均被委为少校厂员。我因等路费和办组织关系，晚回来几天。11 月初，我根据中共日本大阪支部的指示去上海接关系,但未接上。当月,我回到沈阳到兵工厂工作(早在 9 月份我的名字就和其他同学一起报到了，所以我在兵工厂工作的时间从 1927 年 9 月算起）。因为在兵工厂的收入扣除留学学费后所剩很少，我又找了几个兼职工作。一个兼职工作是在东北讲武堂任少校教官，主要搞翻译。另一个兼职工作是在张学良三、四方面军的模范队（招中学生培养尉官和军士的单位）任队长翻译官等。不久，我又到讲武堂附设的高等军学研究班任教官工作，同时还兼模范队和兵工厂工作,直到‘ 九一八 ’事变发生。

我回到沈阳后，立即和中共日本大阪支部联系。 1928 年 2、3 月间的一天,刘伯刚[①] 来通知我说“:中央有位负责同志想要见你，我领你到悦来栈接头!”来人姓廖,[②] 自我介绍是上海组织派来和我接头的。他给我介绍了一些关于我党八七会议的精神，说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国革命正处于低潮，遭到很大破坏，今后的革命任务将更艰巨。他分配给我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情报，并要求每月向上海党组织汇报一次。通讯地点和联系人是上海四川路大东亚酒店一个女人(告诉了我名字)。我还问他 如果上海关系断了怎么办？可不可以找刘伯刚去？他说：你每月往上海写一次汇报，如果间断了三个月没有回信，就是出了问题，你就不要再往上海写信了；你也不要去找刘伯刚；你可以往沈阳城里青年会写信找某某

① 刘伯刚是赵唯刚的同学，1927年 4 月在日本京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室文书。——整理者注。

② 廖，即廖如愿，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当时代表中央和赵唯刚接关系。——整理者注。

人(名字我忘了)联系。见到了老廖后,我就给大阪去信,告诉我的组织关系接上了。从此我就和上海联系。

1928 年年底,上海党组织派来老蔡(蔡伯祥,又名邵挟民)到沈阳建立满洲特委(即特科、特务部),由中央特务部(特科)和满洲省委双重领导。因为在老蔡来之前我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情报,所以到他来时,我已搜集了一大堆情报资料了。其中多是关于军事方面的,包括军事技术、军事生产计划、产品产量品种、原料来源、军队编制、人员配备、军事装备及各种内部情况。老蔡来后,很快把这些材料伪装在箱内运走交给了上级。并建立了满洲特委,蔡为主席,我为秘书长。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情报,掩护同志,营救同志。老蔡是医生,来沈阳后开设善首医院作掩护。他还从山东找来个医助(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不和我发生关系)协助他工作。

1929 年上半年,我根据老蔡的指示,把蒋××(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安排在东北讲武堂学生队去当学兵。后来他因把阅读的我党文件放在床毯子底下,查卫生时被发现,而被学生队队长汲绍刚扣下。蒋被扣后,汲绍刚给我挂电话,说"你送来的那个活宝出事了,你快来吧!"我去后一看翻出的东西,故作不知地问"这是什么?共产党的传单?哪弄来的?!"他说"人是你介绍来的,你问谁?"我半开玩笑地说:"既然如此,那你们就把我送到宪兵司令部去吧!"他笑了笑,说"你看怎样了结这个案子吧?"我说"我又不是你,能说了算?要一定让我说的话,你是督统(察哈尔督统汲金纯)的大少爷,谁能怀疑你呢?还不是你一句话,交个保就得了。或者你们把他押送走,到转弯处就说没看住逃跑了,不就得了!"汲绍刚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的学生,和我同学关系较好,加上送个人情对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于是他把蒋××放跑了,然后说蒋是逃跑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1930 年春的一天,老蔡找到我研究刘伯刚的工作问题,说想派他去讲武堂做兵运工作。于是我把刘伯刚安排在我和杨炳森(杨凤璋)卫兵的住处,说刘是杨的朋友,来找工作,暂时住这里。因为

杨是我同事的好朋友,比较进步,又是机迫平学习班(机关枪、迫击炮、平射炮学习班)的班长,以他朋友的名义出现,接近学习班的士兵更方便。刘伯刚从此就在这里做兵运工作，利用节假日和学习班官兵交谈。贾揆(即贾陶)是这个班的三个队长之一,自己住一个房间,比较方便,刘伯刚常去和他聊天,谈些国际国内形势等,对他的思想进步启发很大。除此之外，刘伯刚还常到东陵山林守备队去找士官聊天，不料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当年夏季,7、8 月间,刘伯刚把党的刊物《满洲红旗》带到野外看(和卫兵住一起看文件不便),不慎在河边洗澡时被人偷去，因而被捕。我和杨炳森得知后，立即到清乡委员会去，想花点钱疏通把刘营救出来。我们穿军装找到审判官、书记官,看了过堂记录,说了不少好话,但是他们不敢放,最后同意对刘佩戴的讲武堂徽章（是我给的）不再追究，接受了那是刘拣来的说法，由此和我们切断关系，但仍然将刘监禁。我回来找老蔡研究此事怎么办。老蔡问了营救的把握大不大。最后他怕营救了刘伯刚,再把我暴露,对革命工作不利,决定先看看情况再说。我通过给刘伯刚送行李的机会，把他在机迫平学习班发展的四名党员的名字记了回来。从此，他联系的对象由我联系。刘伯刚在狱中表现很好，始终没有暴露身份，以“共党嫌疑”被关押了四年，到 1934 年伪满皇帝溥仪登基大赦时才出狱。

刘被捕几个月后，满洲省委派来两人搞军事。一位姓胡的（由苏联归国,后被害,报纸报道时称其为韩元波),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另一位姓黄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为秘书长。他们都由我接关系打铺保租了房子。当时正是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盛行时期，全国到处在搞武装暴动。他们来后，我把机迫平学习班的兵运工作交给他们作。该班芦透云等四名党员，是刘伯刚发展的。他们是由北满博克图来的东北军十五旅三十八团的士兵，在学习期间也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回原部队后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满洲省委军委还在沈阳办了军事训练班，由我负责弄来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和一枚手榴弹，并由我上军事训练课，老黄讲政治课。学员是从抚顺

调来的五名工人党员，学习地点就选在满洲省委军委黄秘书长家里,学习的项目是打枪、投弹技术。后来中央文件很快来了,批判了立三‘左’倾路线,停止全国搞武装暴动的计划,这个打枪投弹训练班就解散了，五名工人党员返回原单位工作。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老胡(即韩元波)拿着我给开的护照,马上启程到北满(博克图一带)去传达中央文件，通知停止武装暴动。老胡到达当天，正召开会议时①,与会的十余人全部被捕,后来五人被杀害②。因老胡在沈阳的房子是我给打保租的，所以出事后满洲省委马上叫我清理了老胡的住处。

1929 年上半年,由于奉天(沈阳)纱厂出事,刘少奇同志被捕入狱了。当时少奇同志就住在我们东北讲武堂附设的高等军学研究班。他来这里住，是通过高等军学研究班的教育长李瑞浩和教育处长韩剑秋(也是湖南人,和少奇同志是老乡)的关系。当时满洲特委书记老蔡告诉我说：我们党有位领导同志住在你们那里，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并叫我了解一下为什么最近高胜岳（过去曾以调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出名）被派来高等军学研究班当总队长，是不是他们嗅到了什么？经我调查了解后，得知高来高等军学研究班纯属偶然，原因是他没处安排。后来我到延安时才知道，老蔡叫我注意保护的那位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1930 年满洲省委遭破坏后，党组织把省委的一些文件装在柳条包内，存放在一个朝鲜族年轻党员家里。他住的房子是一个退役的旅长的房子，由我打铺保租下来的。这位朝鲜族青年和他的妻子经常不敢回家住，或者很晚才回去很早就离开，白天不敢呆在家中,引起了房东的怀疑。趁他们不在家时,房东进到他们屋里察看，见到那几个大柳条包，撬开后发现是文件。这位房东马上找铺保，

① 当时是 1931 年 1 月 13 晚。

② 他们是满洲军委书记韩元波,十五旅三十八团中士班长、中共团工委书记芦透云,十五旅三十八团中士班长、中共团工委委员高万九和十五旅三十八团的连、排长各一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又追问是谁叫打的铺保。我们得知消息后，觉得问题很严重，威胁到了省委和特委的安全。怎么办呢？老蔡是很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最后决定找一辆汽车，晚上八九点钟带上枪和汽油及厚礼开出去,先由老蔡找房东送上厚礼说情,提出交个朋友 如果不成,就动武抢出文件或放火烧掉文件。在行动的那天晚上，房东一看有礼物又有钱,态度就好了些。加上老蔡替我吹了一通,说“帮你房客打铺保的那个长官今天不能来，委托我来看看你。他是士官毕业，和那个房客也不认识，还不是朋友托朋友么！你们都是军界人士，交个朋友么!”那个房东只好让步说“你们把那柳条包拉走吧 告诉你朋友下回可要注意点啊！情况复杂啊!”我们再三表示感谢,把东西全部拉走了。大家都很佩服老蔡，认为处理问题有水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我们在沈阳南满铁路车站发现异常现象 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这时又扩大了许多 原来是铁丝网围着的，现在用木板围起来，防止外面的人看；周围又搭了很多临时军用帐篷，还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我们到四平去一趟，也发现了类似现象，铁路的给水塔旁均加了日本岗哨。看起来日本人要动手了。我们在事变前一个月就向上级党组织打了报告。事变前两周又给辽宁省省长臧士毅打了报告，告诉他日本人要动手了。

1931 年春，老蔡调到青岛工作。他在沈阳的工作由年前来满洲特委工作的吴宝祥同志接替。“九一八”事变后两天我也离开沈阳，到了北平。我在满洲特委的工作至此结束。到北平后不久，安守心拿着吴宝祥的介绍信来找我，叫我到苏联工作。我回到沈阳见到老吴，他说应苏联要求，党组织决定让我去，因为没有别的合适人选了。接受任务后我又到北平，把家里安排了一下，于 1932 年 4—5 月间再离开北平,回到沈阳。为了掩护地下工作,我到伪满军官训练处找了个工作，穿上了伪满军官服。不久，奉天陆军检查成立，我任团长，随即以长春军政部的名义到营口、安东等地检查军队各方面情况，借机把伪满的编制、装备记下来。后来到齐齐哈

尔时，我把这些材料都交给了李秋白（中共地下党员、苏联远东军情报站负责人）。李叫我到北方工作，说以后重点在北满，要防止日本侵略苏联。于是我给伪满长春军政部打了申请报告。这样，我就在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当参事、翻译。我租了一套独门独院的房子，建立了交通站，用电报同苏军情报机关联系。

1933年底，我由齐齐哈尔经哈尔滨到扎兰诺尔再由国际交通送到苏联。不久我到伯力炮校学习，插班二年级，学了一年。接着到基辅坦克机械化学校学了两年。后被派往新疆帮助盛世才建立机械化部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被派任新疆独山石油厂厂长，后因车祸受伤，去苏联疗养。伤愈后回国，1941年9月22日到达延安，改名为赵唯刚。从此又开始在我党领导下工作。我到延安后，先参加了整风，后写了一部十万字的《东北军史料》，手稿交给王家坪军委图书馆负责人刘某（名不祥）保存。日本投降后，我回到东北工作，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教育长、解放军东北军区训练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二系系主任，后转业地方，相继任国务院化工部设计院副院长、对外司司长。现离休在家。

（张金榜整理）

西安事变前的一段经历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周　　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将军执行蒋介石“绝不抵抗”的命令,丢掉东北三省,退入关内。东北沦陷以后,数十万军民背井离乡，多年来的流亡生活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复土愿望。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的阴谋,把东北军调到陕北,迫使其充当“剿共”的先锋。

1935年9月,中央红军一、三军团组成陕甘支队,于10月中旬到达陕北吴起镇。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和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十五军团。11月,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配合,组织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自杀。又在追击中于黑水寺歼灭东北军一〇六师沈克的一个团。加上劳山战斗消灭了一一〇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东北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一一〇师、一〇九师被歼,两个师的番号都没有了,军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其将领开始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早在这一年8月1日,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有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军便乘胜利形势，积极开展对东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直接领导这一工作。总政治部下设一个破坏部(后改成敌工部),却没有部长。当时,我任秘书长,杨尚昆主任对我说:“你兼破坏部部长,负责做东北军的工作。”开始,我主要做被俘虏的大批东北军官

兵的工作。针对东北军的处境,向他们宣传《八一宣言》,提出在全国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具体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不打红军"!东北军抗日,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等等。有一支歌《打回老家去》,很能打动东北军官兵的心。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对俘虏的东北军官兵也采取了宽大政策,从各方面予以关怀照顾。俘虏来的士兵,经过短期训练,全部释放回去。大约放回了两千多人。对被俘的军官,同样采取宽大政策。捉到一〇九师政训处长王某,也采取教育释放的办法。这大批人员释放回去以后,把他们在红军中的所见所闻传播开去,使广大东北军官兵了解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反动宣传就不攻自破。在前线,出现了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来往、座谈、联欢,东北军个别部队和红军暗自商定停火、互不侵犯的局面。特别是做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工作,收效更大。

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我军俘虏。高在北京大学毕业,又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出国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他是最能打仗的团长,得到张学良的器重。他被俘,张学良很痛心。为了开展对东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彭总把高福源从后方请到前方,亲自耐心地向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对高福源待如上宾,让他住在彭总驻地附近,部队演戏也让他去看。经过多次的耐心交谈,高福源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表示要帮助我们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当他有了这种表示以后,彭总就将他的工作交由我来做。

甘泉城是东北军王以哲部一〇七师参谋长刘翰东守卫的。他的师部和主力驻肤施(延安),我们总部驻甘泉城附近。此时,一〇七师一部被我陕甘支队杨得志部和陕北红军围困在甘泉城里。甘泉城不好打,攻了几次没攻下来。我向杨尚昆主任建议,利用高福

源的身份和他与刘翰东的关系，让他到阵地去喊话，做争取工作。得到杨尚昆主任的同意，我和高福源于 1935 年 12 月一天的晚上，带着两个警卫员来到甘泉城外我军阵地上。高福源对城里喊话，指名找参谋长刘翰东答话。少顷，刘翰东来到城墙上，问高福源："你高福源，是红军拿枪逼着你说话的吧？"高福源回答说："不是，我是自愿的。"刘翰东说："若是你自愿的，可到城里面来谈。"这时，高福源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怎么办？我考虑如不让高福源进城，刘翰东会认为高福源不是自愿来喊话的，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我根据高福源被俘以后的表现，认为他对抗日是有一定觉悟的，便当机立断，决定让高福源进城和刘翰东面谈。

高福源进城以后，刘翰东对他非常热情，让他洗澡、更衣、吃饭，并且要他留下，说："你回去再不好回来了。"高福源对刘详尽地讲了我党的方针政策说："我在红军几个月，对红军的情况和他们的抗日主张基本了解。我们东北军只有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联合抗日才有出路。"并说："城外还有咱们的一个老乡（指我）等着我呢。"他顾不上洗澡、吃饭，也不更衣，大约深夜一点钟，就从城里回来了。见我们还在等着他，很高兴地说："我还以为你们走了呢。"接着把在城里和刘翰东会面的情况向我说了一遍。

我把高福源到甘泉城喊话和高福源发现城里驻军生活很苦的情况向杨尚昆主任和彭总做了汇报。彭总说："要慰问他们。"并指示我准备粮食、猪肉、羊肉和蔬菜，准备进城去慰问驻军。三天以后，我准备了二十多个驴驮子，拿着总部的信进甘泉城慰问刘翰东的部队。我抓紧这个好机会，亲自向刘翰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刘翰东说："红军好是好，但是有一点我不同意。你们是红军，苏联也叫红军，你们还不是一个政策！"他回忆说："1929 年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在满洲里和苏联红军打过仗。我是梁中甲下面的一个旅长，被苏联红军俘虏了。他们罚我们做苦工，生活很苦，那时我穿的汗衫，一直保存到现在。"他提起这段往事，仍然耿耿于怀。我向他解释中国红军和苏联红军的俘虏政策不完全一样。但是，他的成见很

深，一时难和他谈得通。我回来以后，马上向彭总和杨尚昆主任做了汇报。彭总说："首先，做高福源的工作，打开缺口，甘泉也不要放松。"

高福源经过去甘泉城和刘翰东面谈之后，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坚决主张东北军不应该打内战，而应该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并主动提出："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要把在红军看到的讲给少帅，说服少帅联合红军抗日。'我认为六十七军驻洛川，军长王以哲是高福源的军长，高福源有条件做王以哲的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向杨尚昆主任作了汇报。他同意我的建议，并请示了彭总，做出决定把高福源放回了洛川。这是 1936 年的春天。

过了一个月左右，高福源又回来了。我问他："你怎么回来啦？"他回答说："我是奉命来的，有重大的事要办。'我把他带进屋里，他说："这次是王以哲军长派我来的，少帅明天要到洛川来，请你们派一个代表与他见面，并商量抗日问题。'原来，高福源回洛川后见到了王以哲，由王以哲将他的情况报告给张学良。这时，全国抗日热情高涨，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东北军内部地下党的工作和东北的进步民主人士开展积极的工作，东北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开始觉醒，促使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接受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张学良将军正急于找共产党联合抗日。我们放回高福源，正好起到了使我党中央与张学良将军建立联系的桥梁作用。

我马上向杨尚昆主任报告。杨尚昆主任立即用电话与彭总联系，彭总说："这是好事，要请示党中央，看派谁去。'彭总立即用加急电报与瓦窑堡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联系。毛泽东同志回电的大意是 事情紧急，从后方派人来不及，让周桓去。当时，我考虑事关重大，任务很重，我的社会经验少，担心难以完成任务。于是，提出是否派一个更合适的人去。这时恰好李克农同志从外面工作回来了，我便向杨尚昆主任说：李克农同志做情报工作，他了解情况，又有经验，让他去比我更合适。杨尚昆主任同意我的建议，经与彭总在电话里研究，决定让李克农同志去。于是我就介绍李克农同志与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福源见了面。大约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送他们一同去了洛川。

李克农同志到了洛川，先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后同张学良将军会谈。张学良提出有关抗战和统战等重大问题，并提出要与毛泽东或周恩来会面。李克农同志回来以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1936 年 4 月,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我党派周恩来副主席到肤施（延安）同张学良将军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延安会谈是张学良将军思想转变的关键，对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队和此后发生的‘ 西安事变 ”,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原载 1986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编者做了个别订正）

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宋　　黎

东北军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非嫡系部队，东北军地下党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力量之一。1936 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旧中国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力量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日益不满,要求抗日的人士越来越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逼蒋抗日,率东北军、十七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到西安进行工作,在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使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付诸实现。毛泽东后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为“ 时局转换 ”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关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这两位千古功臣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已经有口皆碑。但对东北军地下党和广大党员在这一伟大历史事变前后，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的情况,尚未见详尽的记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积极开展征集中共东北军党史资料的工作。原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刘澜波辞世后，我们尚健在的原东北军地下党有关同志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直接、间接了解的情况

如实地撰写出来，供组织上研究和有关部门参考。希望这对后人能有所启迪和教益。

由于我的理论、政策水平有限，对东北军地下党一些问题的看法、提法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我党在东北军的早期活动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内设军事委员会。1929年7月，刘少奇来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当时满洲省委十分重视军事工作。1929年10月18日，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指出："士兵运动，在满洲须马上开始，用各种方法加派干部……接近士兵群众，领导他们作经济的改良待遇的各种斗争，发展党的支部，加紧政治宣传与鼓动，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使他们同情于工农革命运动，对民团亦需要根据此种策略进行……"1927年，留学日本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赵唯刚经组织介绍回国，于1928年春在沈阳接上党的关系。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成立特委，赵唯刚任特委秘书长。他的公开身份是东北讲武堂少校教官，曾先后在讲武堂、兵工厂、模范队、高等军事研究班开展党的工作。从上海党中央学习归来的刘伯刚，经赵唯刚介绍，也到东北讲武堂附设的炮兵教导队当翻译，向学员宣传革命思想。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在学员中发展了四名党员。

刘少奇调回中央后，林仲丹(张浩)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此时东北军中有23名共产党员，但这些党员基本上是个人活动，有组织的活动极少。中共满洲省委从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除了少奇同志亲自领导的时期外，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搞了一些"左"的活动，使我党在东北军的工作遭到重大损失。1930年末，东北军十五旅三十八团驻军博克图。当时该团地下党的力量较强，决定举行兵变。由于目标暴露，省军委书记韩元波等十余人被捕，五人牺牲，使博克图、富拉尔基等地驻军中地下党的

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

1933 年前后，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力量有所发展。六十七军中已有三届党支部。第一届党支部书记杨英杰(张克敏),第二届关成章，第三届王岳实。张学思在这个党支部。共产党员李泽民在百零五师(即一百零五师)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少校营长。还有个别党员在东北军的其他军、师活动。

1933 年 8 月 14 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发生了起义。起义的地址在河北省卫善庄,距廊坊 10 余公里路,归廊坊管辖,故通称廊坊兵变。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六十七军教导大队队长、共产党员杜鹤年(杜长龄)。杜鹤年原是张学良卫队第一队队长;“九一八”事变后随军到北平，不久被掌管张学良卫队的刘多荃撤职。杜鹤年同张敬超（共产党员、东北讲武堂第十一期学生）等人和东北青年学生约二百人组成义勇军，在辽、吉、黑后援会朱涛清等支持帮助下到长城抗战，在离喜峰口不远的怀柔、三河一带活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杜鹤年收了不少枪支和散兵,队伍不断扩充,由原来的 200 多人发展到五六百人。杜鹤年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有旧交，经联系编为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后改教导大队。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一般不对日作战,杜鹤年等要求抗日,党内个别负责人受“左”倾盲动主义思想影响鼓动他把部队拉出来。杜鹤年得知何应钦下令解决教导大队的消息后,鉴于此情况紧急,仓促决定起义,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拥护共产党!”参加起义的约千余人，其中有北平的学生和杜的部下。上级党组织领导这次起义的同志是河北省委的老张。在教导大队当教员的杨英杰参预了起义的组织工作。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在起义的几天前大搞宣传鼓动工作，曾在卫善庄搭台演出文艺节目和发表演说动员抗日。1933 年 8 月 14 日，杜鹤年率领参加起义的部队在卫善庄召开有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打着红旗出发抗日。走了一天多到达玉河边准备渡河，因河里涨水未过去，又被六十七军追来的部队包围冲不出去，被迫宣布解散。起义失败后杜鹤年到了新疆，后被盛世才杀害。

1934 年，原吉林省义勇军冯占海部被张学良编为六十三军。该军开到河北高邑、宁晋一带后，中共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成立了中共六十三军工委。军工委负责人是老金同志（朝鲜族）。朱大光、朱云青、王光伟等地下党员都在六十三军做党的工作。团工委负责人朱大光曾去中共中央北方局请示暴动事宜，未获批准，返回途中病故。1934 年冬至 1935 年初，中共六十三军工委被破坏，老金被捕，党组织通知朱云青等同志撤离。不久六十三军的建制撤销,人员也都分散了。

“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也进入东北军开展党的工作。

刘澜波(刘玉田),辽宁省凤城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在辽宁参加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他协助黄显声在两三个月时间里组织二十余路民众抗日义勇军同日寇作战，镇压了关东军扶植、支持的汉奸凌印清、张学成两支逆军，辽宁军民无不为之称快。黄显声原是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为人豪爽，富有正义感。“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七个警察大队并动员沦陷各县的警察，组成骑兵队在辽西同日寇作战，后来退到热河，将骑兵大队扩建为骑兵二师继续抗日。1932 年受党的派遣，刘澜波在东北军做党的工作，公开身份是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的秘书。他介绍共产党员孙志远、白坚到该师开展工作。1932 年，共产党在骑兵二师成立了师工委，白坚任师工委书记，刘澜波任组织部长，孙志远等同志是师工委委员。先后在骑兵二师做党的工作的还有马融（李涤尘）、宋吉文(宋元奎)、易广居(易国梁)、朱大光、刘梦坡(朱、刘是我东大同学,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对我有积极影响)、白英华(白福炤)等同志。他们发展了党的组织。当时骑二师党的工作分上层和下层。上层工作以师长、参谋长为对象，下层工作以士兵为对象。主管上层工作的是刘澜波、孙志远、马融。宋吉文负责下层工作。朱大光、刘梦坡、易广居、白英华等先后到团里做士兵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白英华等曾组织士兵自治会,进行过反贪污、反扣饷斗争。

1933 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派骑兵师工委委员刘澜波 孙志远到五十三军结识了六十七团团长吕正操，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抗日问题。1933 年秋,易广居等二人从骑二师调到该团,负责一个营的地下党的工作,组织发展很快,全营各连不久都有党员了。

刘澜波重视士兵工作,但他认为做好上层工作也十分重要。在王明‘左’倾路线盛行时,刘澜波不顾非议，坚持做东北军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胆识和气魄。他以真诚态度帮助所接触的东北军军官,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信赖。刘澜波首先做师长黄显声的工作。他曾同黄显声、参谋长董道泉(董元彰)酝酿骑兵二师参加抗日同盟军的事情。长城抗战前，黄显声接受刘澜波建议，从青年军官和流亡青年中选择较进步的一百人成立了抗日义勇队,由刘澜波任队长。抗日义勇队成立后,开展了拥护共产党、坚持抗日等活动,并决定参加抗日同盟军,后虽因抗日同盟军失败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却为骑二师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3 年 1 月,共青团员陈少景曾在刘澜波组建的抗日义勇队当兵做下层工作，后调骑二师三团任地下党支部书记。

刘澜波在东北军中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加强同东北军上层军官及有影响的东北名流的联系,向他们宣传抗日主张。为了争取张学良将军抗日，刘澜波做了许多工作，并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 1934 年初,张学良既想抗日,又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刘澜波借机去汉口看他,有理有据地讲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流离失所,到处受气,张将军(张学良)出国期间东北军更是倍受歧视与侮辱等情况,指出只有抗日复土才是唯一出路。张学良听后激动地表示:“要抗日,我们还要下地狱!”东北人民就是要有下地狱的精神才能复土还乡!”孙志远、白坚等到骑兵二师,同刘澜波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以办图书室、开展俱乐部活动等形式团结广大官兵,改变旧的官兵关系并坚持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为武装抗日做了长期的思想准备工作。1933 年 4 月,刘澜波因掩护孙志远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他据理揭露、驳斥敌人,表现了共产党人机智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